

# 目 录

## 第十九卷

陈嘉庚光辉的一生	张楚琨(1)
我的父亲陈嘉庚	陈国庆(13)
陈嘉庚玛琅避难纪实	黄丹季(16)
陈嘉庚访问延安	王唯真(21)
陈嘉庚与蒋介石决裂 经过	庄明理 洪丝丝(26)
陈嘉庚在国民参政会上的电报 提案	肖用(32)
抗战期间陈嘉庚在福清谈回国 视察观感	郑添恩(40)
陈嘉庚与南侨总会	黄奕欢(43)
陈嘉庚与《南侨日报》	张楚琨(50)
陈嘉庚先生在兰州	林叶(59)
忆迎陈嘉庚先生莅漳视察	黄文英(63)
滇缅公路上的华侨机工	庄明理(67)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 始末	冯君锐(73)
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 岁月	陈宋儒(84)
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	陈碧笙(87)
解放后陈嘉庚扩建厦门大学的 回忆	陆维特(91)
陈嘉庚与华侨博物院	陈永定(96)
忆流亡中的郁达夫	张楚琨(100)
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补遗	金丁(111)
华侨革命活动家林义顺 传略	陈荆淮(118)
开发新福州的著名华侨先驱黄 乃裳年表	肖忠生(127)

我的叔父胡文虎创业记	胡尚增(135)
华侨先锋运输大队的前前 后后	卢剑秋(139)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星洲华 侨义勇军	金星众(142)
新加坡华侨爱国抗日见闻	张新豪(155)
南洋杂忆	胡愈之(158)
棋樟山七日	夏青峰(172)
华侨世家话沧桑	李辛殿(176)
侨居新马二三事	黎扶西(185)
南洋大学的倡建者陈六使	萧村(191)
新加坡华侨中学五·三一事 件回忆	蔡自新(196)
新马文学生涯杂记	萧村(201)
马来亚琼籍侨领王兆松	哥冈(208)
我所知道的南洋华侨黄 陆佑	李文(212)
南洋华侨反对英帝摧残华侨教 育的斗争	董大本(220)
奔向延安奔向革命	廖冰(227)
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吉隆 坡队	黄炜然(239)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 的战斗历程	马林(250)
中南橡胶厂对抗战的贡献	陈维新(271)
粟芭村琐忆	陈韩萌(279)
我在马来亚参加抗日活动的 回忆	潘珠英(284)
新马抗日时期的琼籍华侨	陈世民(287)
马来亚文律坡华侨的抗日 斗争	陆彩萍(293)
在海外学生运动洪流中	

成长	萧诚	(296)	去延安参加“七大”	苏惠	(519)
在马来亚集中营	李君哲	(302)	参加泰国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		
粒粒锡沙 滴滴血泪	李子核	(319)	回忆	杜英	(523)
战前马来亚华侨矿工	曾定	(324)	旅泰华侨生活一瞥	谢群	(527)
爱国侨领李光前先生	王贞武	(328)	缅甸华侨与辛亥革命	黄馥生	(532)
薛两清生平事略	吴春泉	(331)	缅甸华侨参加辛亥革命及光复		
记爱国华侨汤登育先生	黄文英	(340)	滇西经过	陈孝奇	(537)
爱国华侨余长钺烈士事略	林庆森	(343)	忆在延安的日子里	马兴惠	(539)
南洋华侨对旧民主革命的支持	胡先传 姚肖廉	(346)	缅甸华侨救护队回国抗日		
为民主解放而献身的华侨女战士雷德容	邢锡麟等	(353)	纪实	马兴惠	(543)
爪哇华侨集中营纪实	张又君	(359)	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奔向		
忆侨居印尼的战斗岁月	陈炎铨	(366)	延安	王建华	(551)
东爪哇华侨反帝反殖爱国斗争的回顾	傅子任	(369)	为祖国解放献身的冯文		
海外赤子沧桑录	陈夏苏	(379)	烈士	翟业高	(556)
辛亥革命前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情况的回忆	廖嗣兰	(417)	回忆越南华侨的爱国救亡		
我的第二故乡——山口洋	刘燕球	(423)	运动	徐安如	(561)
南洋吧国公堂一斑	梁德坤	(427)	越南北方华侨历史演变		
潮汕铁路创办人张榕轩兄弟	李松庵	(430)	概况	陈贻泽	(566)
印尼华人教育的兴起与盛衰	杨启光	(440)	我所知道的海防华侨中学	黄棣华	(573)
忆爪哇华侨中学	陈秉乾	(459)	到延安的前前后后	白刃	(577)
棉兰华侨教育追记	黄鹤	(462)	回忆在延安的岁月	庄焰	(589)
棉兰最早的华侨学校——敦本			菲律宾华侨劳工团体联合会的		
学校	林人欢	(466)	战斗历程	沈福水	(595)
雅加达中华会馆及其所办的社会事业	梁德坤	(470)	爱国侨领甘文芳	李娟 荣瑞	(612)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周铮	陈修发	(477)	华侨巨子吴锦堂	童玉民	(615)
脚印	周铮	(481)	泪洒东瀛	何中堂	(619)
焕发着爱国光辉的历程	王绵长	(489)	日本神户华侨史话	童玉民	(623)
旅泰云氏家族史略	云雯天	(506)	回忆旅居日本三十二年	吴伯康	(640)
潮汕地区侨资民族工业的先驱高绳芝及其家族	卢继定	(510)	日本神户华侨办庄的发展及其		
爱国华侨林玉兴事略	王保英	(517)	衰落	叶少林 许只	(648)
			旅朝侨胞话今昔	崔殿芳	(658)
			回忆旅印华侨青年进步组织的		
			活动	侯一萍	(662)
			旅居美国七十年	司徒美堂	(665)
			我的生活经历	司徒美堂	(700)
			司徒美堂先生生平事略	树煦	(704)
			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门致		
			公堂	司徒丙鹤	(713)

忆先父司徒美堂..... 司徒柱(727)	华裔企业家黄惠珍和侨泰合资企业..... 谈君 晨风(838)
在祖父司徒美堂身边的日子..... 司徒光(730)	刘承桓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奉献..... 朱曾富(841)
我所知道的司徒美堂..... 唐明照(735)	古巴见闻录..... 黄作湛(843)
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司徒美堂老人..... 连 贯(737)	华侨血沃美洲..... 谢 创(850)
爱国侨领司徒美堂的抗日救国活动..... 张兴汉(742)	我在巴西..... 毕务国(852)
侨居美国的前广东空军人员参加抗战的二三事..... 刘锦涛(748)	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 张邦永(855)
美籍华商李国钦..... 章执中(754)	爱国华侨王守义事略..... 程一民(866)
电脑大王王安博士的晚年..... 周鑑文(757)	重洋风雨忆当年..... 庄敬民(869)
著名美籍华裔学者田长霖博士..... 朱顺之(759)	旅德华侨抗日救亡运动..... 秦丰川(876)
杰出学者汪志馨..... 周忠雅(761)	南非华侨情况忆述..... 叶 迅(884)
享誉世界的医学家李振翩..... 刘笑春(764)	我在毛里求斯的见闻..... 刘新莽(892)
辛亥前后檀香山几家宣传革命的报纸..... 黄光甫(772)	在马达加斯加的广东人..... 刘新莽(901)
旧金山天使岛的斑斑血泪..... 黄大锵 林仲芬(775)	辛亥前夕华侨在中山香洲开埠经过..... 郑砾石(909)
旅美见闻杂忆..... 谢英明(783)	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兴亡..... 陈纹藻(914)
爱国侨商陈宜禧与新宁铁路..... 陈 邦(803)	华侨投资与泉州工商业..... 周基亮(920)
广州美华百货公司及其经营管理..... 朱英南(809)	余杭县归侨合作农场..... 余侨联(927)
纽约华侨洗衣馆的变迁..... 罗记瑞(816)	海南涉外劳工的悲惨遭遇..... 符国华(931)
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成立经过..... 雷卓峰(824)	海外海南人群体形成及其业绩..... 谢鹏飞(936)
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的组织和活动..... 陈厚文(829)	海南华侨中学史实..... 符悦虹 冯立奇(942)
	琼侨与琼侨回乡服务团..... 陈克攻(951)
	归侨教育家的精神永在..... 韩 萌(955)
	在《星系报》十二年..... 罗铁贤(964)
	网坛华侨三球星..... 止 戈(972)

# 陈嘉庚光辉的一生

张楚琨\*

华侨史上有一个光辉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千百万华侨的心里，受到祖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这名字贯穿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长世纪中，和“倾资兴学”联在一起，和“爱国爱乡”联在一起，和“诚毅”、“坚持正义”、“明辨是非”、“民族气节”联在一起，这便是毛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他“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一)

陈嘉庚 1874 年 10 月 21 日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的一个华侨世家。曾祖父陈时赐兄弟五人中有两个出洋定居，当时称为“番客”。父亲纓杞（又名杞伯）远渡新加坡开了一家米店。大伯父纓节和二伯父纓酌也出过洋。

陈嘉庚生于国难，长于国难。在他诞生前 32 年（1842 年），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打了败仗，订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与集美一水之隔的厦门被迫成为“五口通商”的一个口岸，同安人总兵陈化成在这场战争中壮烈殉国。他诞生那年，日本借口琉球遇难船民事件，进犯与集美遥遥相望的台湾，清王朝又签订了一个屈辱的《中日北京专约》，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他 11 岁到 12 岁，法国入侵福州，爆发马尾海战，“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他第一次出洋是 17 岁（1891 年），正值日本大肆叫嚣“反华战争”；第二次出洋是 21 岁（1895 年），《马关条约》把台湾奉送给日本了。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祖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势下，他第三次回国，在集美和厦门住了三年，亲眼看到厦门怎样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鼓浪屿怎样成了帝国主义共同占有的“公共租界”，英美商人在那里贩卖鸦片，设“卖人行”，运出“猪仔”，进行各种经济掠夺，日本浪人横行霸道，走私犯、土匪、买办、汉奸到处肆虐，家乡人民忍无可忍，纷纷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辱国丧权。

陈嘉庚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国难深重的环境下度过的。集美是个不大的半岛，三面环海，土地很少，当时共有 2000 多人，全部姓陈，主要以捕鱼和海涂养殖为生，真是一穷二白。但在历史上却有过光荣的传统，反清抗荷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这里建立过基地，留下了“延平故垒”和“国姓井”的遗迹。陈嘉庚 9 岁入私塾读“三字经”、“四书”，识字不多；16 岁才对古文和报刊“有一知半解”，后来能够写文电，著书，完全靠自学。乡村文化落后，私塾学生很少，女孩不得入学，十余岁儿童还光着屁股成群游戏，给他留下触目惊心的记忆，促使他日后下定办教育改变家乡面貌的决心。

\* 作者为陈嘉庚生前友好。

陈嘉庚的经济事业在南渡第14年（1904年）才初露锋芒。这以前的13年一直在他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服务。顺安停业，他集资7000多元（叻币，下同），创设菠萝罐头厂，号曰“新利川”；不久又接管也是经营菠萝罐头厂的日新公司。两厂在3个月中获利近4万元，给他莫大鼓舞。

当时，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这位具有远大眼光的年轻实业家认为大有可为，购种子2000元，播种在菠萝园中。到1925年他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他看出工业的重要，开办橡胶制品厂，生产胶鞋、轮胎和日用品。先后在国内各城市，南洋和各国大埠设立分销店100多处，直接代理商遍及五大洲。我国20年代到30年代的学生和市民很多都穿过钟标的陈嘉庚鞋。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等，厂房达30多处。他的资产在全盛时期（1925年）达到1200万元（叻币，约值黄金百万两）。

陈嘉庚经营实业30年，为侨居地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引进橡胶，进而大面积种植，被称为新加坡马来亚橡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有计划、有组织地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他培养成千成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著名的大实业家李光前、陈六使等都出自他的门下），造就了侨居地经济的接班人。

陈嘉庚经营制造业还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为祖国民族工业训练人才。他说：“对制造厂不惜垫资扩充者，以20世纪为树胶之时代，日本小国尚有胶厂四百多所，以我国之广大竟无一相当树胶厂。新加坡为产胶区域，政权虽属英国，所需男女工人概我华侨，化验制造各机器臻完备，出品种类众多，可以训练职业工人，如师范学校之训练学生，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由此可见，祖国工业化和引进人才早就是他的夙愿，他的理想。

## （二）

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浪潮冲击着南洋华侨社会。孙中山1906年2月来到新加坡，不久同盟会分会假晚晴园成立，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的中心。邹容的《革命军》改名《图存篇》广为传播，革命党人创办的《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论战日趋激烈，孙中山亲自领导这一批判改良主义的斗争，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连续发表《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等文，风靡一时。陈嘉庚是《图存篇》与《中兴日报》的忠实读者，思想受到很大影响。经过林义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亲聆其革命言论，极为钦佩，遂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胜利，福建光复，召开闽侨大会，他被推举为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20多万元（叻币）支援福建。另筹五万元支持孙中山。如同许多前一辈的爱国志士一样，陈嘉庚是在孙中山哺育下开始革命活动的。

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一旦被推翻，爱国华侨的欢欣鼓舞可以想见。陈嘉庚决心回乡办教育以报国，在《南侨回忆录》中他写道：“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1913年“乡立集美两等小学”诞生了。在陈嘉庚胞弟陈敬贤及弟媳王碧莲的协助下（学生称陈嘉庚为“校主”，称陈敬贤为“二校主”），陆续增办各种类型学校，到1927年计有：男小、女小、男

师范、男中、女中、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幼稚师范、国学专门学校共 10 所学校，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1923 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此确定。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村”，全国找不到第二个！

五四运动宣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孙中山认为是“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陈嘉庚看到了新的希望，以愚公移山的气概回国筹办厦门大学。筹办“通告”是一篇激动人心的爱国宣言：“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认捐开办费 100 万元，常年费共 300 万元。这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于 1921 年 4 月 6 日开学，陈嘉庚独力维持了 16 年。后来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态度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经费。1937 年厦大改为国立，他十分沉痛：“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穷！”实则留下了一座永为后人所纪念的丰碑！

陈嘉庚还以同样热诚发展侨居地的教育事业，在新加坡创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其中有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崇福小学、南侨师范、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和南洋华侨中学，后者是南洋第一所华侨中学。

从办学主张和办学实践看，陈嘉庚不但一个教育事业家，而且不愧为一个卓越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概括为几点：第一，提倡女子教育，突破封建禁锢，开风气之先；第二，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第三，20 年代即提倡学生要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第四，主张“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第五，为了振兴实业，培养生产技术人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第六，要求普及教育，订下同安“十年普及教育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以开拓者的姿态和革新者的精神，心力交瘁，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真正做到“诚毅”二字。

关于办学的动机与目的，陈嘉庚自己说得很清楚：“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又说：“复以平昔服膺社会主义，欲为公众服务，亦以办学为宜。”有人批评他为“教育救国论”者，他对友好解释道：“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

陈嘉庚对捐资办公益的热心家勒碑留名，对自己却不居功、不务名。他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建了多少高楼大厦，没有一所刻上他的名字或以他的名字命名。1923 年集美学校师生和校友为了庆贺他的 50 寿辰和表彰他的兴学业绩，募捐筹建“介眉亭”。他拒绝了，认为“建亭祝寿是沽名钓誉”，“决不接受”。

陈嘉庚可贵的民族气节，在不接受施舍式补助一事充分表现出来。战后，集美学校校舍遭日本狂轰滥炸损坏不堪，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厦门分处拟予补助。他复函道：“国家不幸，遭抗战之损失，战事告终后，不能奋志自主，以图强盛，反而依靠外国救济，政府如是，社会

如是，华侨机工复员亦如是，甚至教育机关亦如是，其可耻可悲、可羞可痛，为何如是耶！”

### (三)

殖民地的民族资本同殖民者垄断资本的斗争十分激烈，华侨民族资本家备受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的欺凌和压迫。当资本主义危机席卷全世界包括殖民地的时候，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力图把危机转嫁给殖民地人民，对民族资本的压迫更为加重。陈嘉庚一扫民族资本家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硬骨头精神同垄断资本集团进行不折不挠的斗争。他写的《个人企业追记》，追述斗争的事迹，人们可以从中找到他为什么那么憎恶资本主义，痛恨帝国主义，希望有一个强大祖国的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同时对他坚持办学，不惜牺牲身家财产的精神和行动表示钦佩。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加深，陈嘉庚的经济事业从1926年起开始走下坡路。橡胶价格一落千丈，他属下规模最大的谦益胶厂第一次亏损30多万元，橡胶园、米店和黄梨厂均无利可图，这年汇给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费用总数仍接近100万元。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发生，陈嘉庚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并发起抵制日货，致使橡胶制造厂被奸商放火烧毁，加上日货削价倾销，整个资产损失过半。两次卖出橡胶园400多万元，尚不敷支出，只好向外国银行举债300多万元。1929年到1931年为世界经济大恐慌时期，橡胶从每担最高价二、三百元跌至最低价七、八元，陈嘉庚积存货品跌价不下百余万元；无收入而支出不减，又再举债100多万元。垄断资本集团利用债权人地位，强迫陈嘉庚改作股份有限公司，并提出停止维持两校经费的条件，陈嘉庚愤然说：“不，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对方退了一步，议定两校经费每月限5000元。他任董事经理，参加股份的资产犹值200多万元。1932年世界经济略呈转机，“似有否极泰来之像”，英银行团却不顾陈嘉庚的意见和劝告，硬要各地橡胶厂出租，并把设在国内100多处和南洋各国的分行支行全部关闭。陈嘉庚为了两校经费打算，采取化整为零的打埋伏策略：将巴双厂租与南益，南益出资，利息扣后，有利全数充厦集校费；麻坡厂租给益和，利息扣后，有利全数充两校校费；怡保、太平等厂则招诸经理人合租，他也参加一份，有利抽三成助校费；杏株厂租给宗兴公司，立约相同。这个策略得胜了，陈嘉庚战后汇回近千万元（国币），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就靠这些利源。各分厂出租以后，陈嘉庚把希望寄予制造胶鞋、胶靴、日用橡胶品制造厂。当时形势极为有利，加拿大经济会议（1933年9月）提高关税壁垒，新加坡是自由港，没有增税，世界各地纷纷来订货，陈嘉庚估计制造厂的胶鞋每月可得利12万元，一年后各业可以复兴，深自快慰。但是希望落空了，一个“魔商”（即垄断资本集团）要求把所产胶鞋归他一手专卖，陈嘉庚极力反对。英银行团说：“我们英国利权不容他人染指！”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终于在1934年底收盘结束。他经营的企业失败了，但是“倾家兴学”的美名传扬于海内外。没有悔意，没有气馁，1934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的自传，题目叫做《畏惧失败才是可耻》，足以表明他不屈的精神风貌。

经营实业数十年，同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打了长期交道，特别是1929年—1931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的袭击，使陈嘉庚从切身经验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1933年4月26日刊载在《南洋商报》的论文《不景气之历史观与南洋华侨当前应采之策略》，提出轰动一时的论

点：“鄙见所及，欲救不景气之希望，只有两事，非战争则共产主义。战争属于治标，共产主义可以治本。然治标或可较易见的，唯非根本之解决，徒演人类之惨剧。至于治本，虽生效较迟，然目的一达，则世界大同。平均工作，则工人既免失业。工作至多四小时，衣食无缺，老幼疾病，公共负责。既无私业之竞争，复免患得与患失。尧天舜日，真人类无穷之幸福也。”这一大胆猜测果真得到证实：过了六年，即1939年9月，希特勒侵入波兰，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又10年，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尧天舜日”临近了。陈嘉庚晚年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热忱不是没有来由的。

#### （四）

陈嘉庚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从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鼓吹抵制日货起，就在华侨社会发生很大影响。1928年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担任会长，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培养和训练一批爱国筹赈的骨干分子。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展开，他又被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华侨领袖地位从此确立。

1938年成立的南侨总会是代表当时全南洋800万华侨抗日救国的统一组织，名义上称为“筹赈祖国难民”，实则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为适应当地环境，遵守当地法律，筹赈会采用了慈善性质的名义。陈嘉庚应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吧城侨领庄西言的要求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委托，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英属香港、马来亚、缅甸、北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西里伯、美属菲律宾、法属越南及泰国各地区45埠168人，陈嘉庚被选为领导机关主席，他致词阐明召开大会的“第一义”说：“抗战严重期间，凡我侨胞自应精诚团结，集思广益，俾能加紧出钱出力，增强后方工作。”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华侨爱国大团结的新阶段。南洋各属各埠的筹赈会加入南侨总会者达80多所，各属各埠的筹赈会又设分会千百所。参加筹赈会者有各帮（闽帮、粤帮、潮帮、客帮、琼帮、三江帮等），各行业（各种同业公会），各团体（工会、妇女会、同乡会、宗亲会、学生会、青年组织、文化组织等），选为领导成员者有侨领、社会名流、记者、教师和基层群众代表。有了这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加上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担任领导人，华侨筹赈救亡工作遂在全南洋范围内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取得辉煌成就。

最大的贡献当然是募集巨款援助祖国抗战。以1939年而言，抗战军费为国币18亿元，华侨汇回祖国之款11亿元中捐款约占10%。南侨总会抗战义捐约国币5亿元，主要依靠群众用各种方式劝募，有特别捐，常月捐，节日献金捐，货物助赈捐，纪念日劝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剧球赛捐，舟车小贩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等等，是一点一滴积起来的群众血汗！陈嘉庚在重庆报告：“富侨虽多，所捐者亦属有限”，“而劳动界颇踊跃，虽辛苦所得工资，亦能按月捐出多少，故能集腋成裘。”

派遣机工回国服务，是华侨支援抗战的另一大事。当时沿海口岸都被日军占领，只有越南和滇缅路还能通行。由于缺乏司机和修理技工，对外运输感到困难。国民党官办“西南运输公司”委托陈嘉庚代为招聘。南侨总会六号通告发出后，热诚报名回国者达3200余人，出现了极为动人的父送子、妻送夫的场面，对于支援前线起了显著作用。终因行政腐败，管理

太差，严重挫伤了这些爱国志士的热情和积极性，不断有投诉书寄回，甚至有逃回来的，使陈嘉庚寝食不安，日夕思考着：这是为什么？

陈嘉庚在南侨总会成立不久，向重庆国民党对敌妥协派打了最响亮的一枪，这便是震动中外的反对汪精卫对日主和的提案。在广州、武汉相继陷落的紧急情势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一时妥协气氛弥漫重庆，出现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最大危险。陈嘉庚和汪精卫有旧，曾拟聘其为厦门大学校长，后不果，他这时不顾私谊，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打了一封电报给汪，指出“和平绝不可能”；汪复电称“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往还数电，眼见无可挽回。恰好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向大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会上一致通过。邹韬奋称这寥寥十一个大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汪逃往香港发表“艳电”，赞成日本首相近卫声明三原则，陈嘉庚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看到只开除汪贼国民党党籍，未宣布国法处分，又致电追究到底：“今日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而独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众所莫解！”接着南侨总会发出通告第二十号：“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陈嘉庚就是这样敢怒、敢骂、敢斗争、除恶务尽，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

1940年3月，陈嘉庚亲自率领南侨总会所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简称“南侨慰劳团”）回到祖国，这是他一生的大转折，思想认识出现了飞跃的变化。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曾任“马来亚华侨购机寿蒋会”主席，接受蒋介石为表彰其兴学功绩而赠予的二等采玉章，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宣言称“中国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蒋委员长之意志，即中国全国国民之意志”，抗战义捐扫数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然而，他尊重事实，明辨是非，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醒悟过来了，分清谁是谁非，从而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身上。

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生活的里程碑。不管蒋介石怎样捧他，拉拢他，随后又怎样干扰他和中共领导人接触，阻挠他前往陕北，都不能动摇他探索国共磨擦真相，劝说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决心。在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和侯西反的陪同下，陈嘉庚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下榻于设在窑洞的招待所。

恰巧李铁民触车碰伤住院，陈嘉庚在延安过了毕生难忘的九天。在这期间，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进行多次深入的交谈；参观女子大学和第四军校；与财政、公安、司法负责人（均福建籍）谈话；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和归侨男女青年；出席延安各界欢迎会和欢送会；参观西塞县的铁工厂、印刷厂。根据所见所闻，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主席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后来他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上写道：“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怀着“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心情，陈嘉庚决定凭良心和人格说话，不待到南洋，出了延安界，如有人问，一定据实报告。6月24日在重庆应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他讲演《西北的观感》，介绍了在延安所见所闻：“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了，一

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一年之内开垦了百多万亩田地，这些都是事实。”在国民党控制下的“陪都”，一个无党派的爱国人士讲了这样坦率的老实话和公道话，当然使大后方人民耳目一新，受到极大鼓舞。国民党反动派非常不满，叫侯西反出来扮演说客（侯早些时候已被拉到三青团中央当小头头），陈嘉庚对这个有数十年交谊的旧友说：“你和我同行，我哪句话不是事实？共产党有良好政治，外间毁誉算不了什么！贵党应该实行良好政治与之竞赛才对！我绝不能昧良心指鹿为马！”蒋介石亲自出马了，一见面就“面红气盛，声色俱厉”，大骂“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第二天，又请陈嘉庚吃午饭，要求陈嘉庚谈谈“对国民党有何感想？”陈嘉庚不畏强暴，把海外国民党员的丑行照实说了。其威武不能屈也如此！

陈嘉庚继续视察，历经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进入福建，回到阔别十九年的家乡集美，到处都可以看到国民党当局“上下贪污，猫鼠同眠，误民弊政，无所忌惮”的现象，尤其使他痛心、愤慨不已的是福建省当局苛政祸闽的大量罪行，他要求各地同乡“万不可坐视不救，袖手旁观！”原集美学校校长叶渊这时任广西省关税局长，劝陈嘉庚说：“这里官员对国民党有很深的印象，凡不利于国民党的事，请注意别说。”陈嘉庚回答：“他们不问，我一定不说；若问，我必须表白是非，不能谄谀敷衍，应酬了事！”

陈嘉庚从仰光，经马来亚回到新加坡。一路上受到侨胞空前热烈的欢迎。他揭露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称颂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其英勇抗敌的功绩，断言：“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国民党派吴铁城专程到新加坡、马来亚搞“倒陈”活动，用尽一切鬼蜮手段，不能动陈嘉庚一根毫毛，其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陈嘉庚在第二届南侨大会仍当选为南侨总会主席。大会《宣言》对陈嘉庚的评价是：“公忠谋国，一生如一日。”“识足以辨奸，才足以服众，德望足为群伦矜式。”大会认为“抗战期间，南洋华侨不能无筹赈总会之组织，则不能无陈主席之领导。”

陈嘉庚为民请命，领导一个斗争又一个斗争，继南侨大会之后召开南洋闽侨大会，揭露国民党闽省当局种种祸闽暴政，要求采取行动解闽民于倒悬。大会选举陈嘉庚为闽侨总会主席，电请中央政府认真查处，反暴政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

## (五)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1941年12月8日在马来亚哥打答汝登陆，同时轰炸新加坡。英军一开始就失掉两艘主力舰“太子号”和“击退号”，在马来亚半岛节节败退。新加坡人民却斗志昂扬，立即组织起来，要求武装保卫新加坡。英殖民当局直到战争爆发一星期后，才请求陈嘉庚出面领导抗敌动员工作。陈嘉庚从许多迹象看穿了英殖民当局没有坚守新加坡的决心，英军没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志，所谓“抗敌动员”不过是一种缓和市民情绪、应付门面的做法而已，心里很踌躇；然而华侨民气那么旺盛，青年那么敌忾同仇，使他觉得义不容辞，乃应英总督的请求和侨民大会的选举担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主席。该会下设劳工服务团、保卫团、民众武装部、宣传部、总务部。国民党员林谋盛任劳工服务团主任，马来亚共产党员林江石任民众武装部主任，新闻界泰斗胡愈之任宣传部主任。在短短45天内做了很多工作，为后来三年六个月马来亚抗日游击战争开了先河。英殖民当局延

到兵临城下，新加坡即将放弃的紧急关头，才发了 1000 支旧枪给新加坡华侨抗日义勇队，把他们送到前线当炮灰。陈嘉庚认为英殖民当局这一着“最为狡猾残忍”，因为英军这时还保存六、七万人，为什么不开赴前线，却让这批未经训练的华侨青年去送死？“敌人入境必因此多杀许多华侨！”（后来果然发生日军屠城惨剧，即所谓大“检证”）。英总督准备当俘虏，陈嘉庚只好出走了。

一场和日军竞逐的场面出现了。陈嘉庚 1942 年 2 月 2 日来不及通知家人，在四位同侨的陪同下，乘一只运载木材的小火轮开往苏门答腊的淡美那岸去。由于估计国民党必不容立足，祖国归不得；所以选择一水之隔的尚未沦陷的荷印作为中转站。哪知人到马老白，日军已占领巨港。人到直务，占碑的荷印殖民官员也准备逃之夭夭。陈嘉庚为争取时间，从巴东乘船至爪哇芝拉札，会同吧城庄西言（南侨总会副主席）匿居于展玉陈泽海橡胶园，而日军复占领了全爪哇，至此陈嘉庚陷身于敌人的包围中。集美校友郭应麟、廖天赐及郭夫人林翠锦，厦门大学校友黄丹季、陈明津，冒生命危险迎接校主移居梭罗，旋蛰匿玛琅。

在敌军警到处搜捕华侨领袖的风声鹤唳中，陈嘉庚化名李文雪，剃掉留蓄数十年的胡子，同黄丹季、郭应麟、林翠锦及其二幼子结成一个特殊的家庭，在玛琅匿居下来。几次出现敌人闯入住宅的惊险场面，老人家镇定自若，临危不惧，校友应付自如，有勇有谋，得以化险为夷。老人家看到黄丹季等常常忧心如焚，如坐针毡的情状，泰然对他们说：“你们绝不可如此。人生自古谁无死！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我作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像我这么大一把年纪，死也不算夭寿，你们千万不要为我着急。”这种至大至刚、浩然正气的谈话，使掩护他的校友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愿将自己的生命，换取校主的安全”。

老人避居玛琅迁移多处，其中有玛琅巴蓝街 4 号黄丹季家，外南梦巽勿瓦朗校友苏浩然家，峇株和笨珍间校友李荣坤家，最后定居于巽勿佐村一所租来的荷兰人别墅，这就是《南侨回忆录》所称的“晦时园”。

《南侨回忆录》是陈嘉庚以“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在敌人的鼻尖底下写成的。如果敌人发现，不用问，就可以证明作者为谁。为什么要写这本自传呢？《弁言》说：“我国此次国难，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南洋千万华侨，对祖国之贡献如何，不但今时国内外多未详知，而此后必更销声匿迹矣。抗战胜利后，我国史书即有记载，亦不过略提海外华侨曾捐助慈善救济费若干已耳。”此书“不但使海内外同胞知南侨对抗战之努力，以及对祖国战时经济之关系，亦可免后人对今日侨胞之误解也。”全书 30 万言，全靠记忆写成，叙事真实，文字无华，体裁别具一格，为传世之作，在华侨史方面永放光芒。

在这期间，陈嘉庚作了自称“俚句”以明志的述志诗，有四句这样写：“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蹈事故。”他搞到一小包“氰化钾”藏在怀里，随时准备以身殉国。他崇高的民族气节足为后人矜式。

1945 年 10 月 6 日，陈嘉庚安全回到新加坡，受到 500 个社团的联合欢迎。同年 11 月 8 日，重庆十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主席送的“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单条，成了历史性评价；周恩来同志及王若飞同志的祝词：“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传诵于海内外。

## (六)

日本投降了，联军胜利了，中国往何处去？谁来领导建国？国共两党能合作么？陈嘉庚结束了流亡生活，在吧城华侨欢迎会上，第一次演讲就谈这些全国人民包括爱国侨胞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他强调“建国必先认清是非，如是非不先认清，则政治上一切建设都无从提起。”那时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他发表了有倾向性的言论：“若此次国共会议能真诚合作，实际推行三民主义，诚我国家无穷幸福。设或不幸分裂，最低限度，亦必有一方能真实行三民主义者。”是非之辨，不言而喻。

在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国民党虽然勉强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却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陈嘉庚看到当时国人对国共合作一事多抱乐观，“独不以为然”，认为“蒋介石没有诚意”，“民主非流血不易得”，给《经济导报》为《双十协定》题词写了4句话：“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焚”。后来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谈到这件事：“过去与蒋介石谈判，正如陈嘉庚先生在1946年打给我的电报所说，是‘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是又不能不谈”。

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一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爆发了”。陈嘉庚义愤填膺，于9月11日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杜鲁门总统，美国参众两院议长，驻华特使马歇尔及美大使司徒雷登，谴责美国“多方援助贪污独裁之蒋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要求‘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这一正义呼声，震动了国际舆论，予美蒋反动派以有力打击。华侨社会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搞所谓“反陈”运动，公正的华侨社团和民主势力则表示“拥陈”与之对峙。实际上所谓“反陈”与“拥陈”，就是一场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

民主势力需要有自己的舆论阵地。胡愈之、张楚琨、李铁民协助陈嘉庚创办《南侨日报》，这是一家规模巨大的大型华文报纸，诞生于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1946年11月21日），被封于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9月21日），对于团结广大华侨群众，特别是团结各帮派，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到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起了巨大的舆论作用。群众称之为“民主堡垒”，“南天木铎”。创刊号刊载了董事主席陈嘉庚《告读者》，阐明办报宗旨：“我海外华侨本爱国真诚，求和平建设，兹故与各帮侨领，创立《南侨日报》，其目的在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孙国父建国之主旨。”该报在3年又10个月的战斗中，宣传祖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促进华侨的爱国大团结，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同时就新加坡马来亚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为广大侨民的切身利益服务。陈嘉庚发表许多专论和演讲词，主要的有：《论美国救蒋必败》、《从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蒋介石表示不要做总统》、《蒋介石的最大错误》、《中国内战何日告终》、《明是非，辨真伪》、《国共决无和平可言》，这些文章和讲词都是他自己动手，而不是秘书代笔的。他预言解放战争将在1949年取得胜利，表明他不但具有政治信心，而且富于政治卓见。党中央给予《南侨日报》以很高荣誉，毛主席为该报三周年题词是：“为侨民利益服务”，周总理的题词是：“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

权益而奋斗”。

很显然，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爱国运动相呼应，海外华侨也开辟了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第三战线，除了《南侨日报》以外，陈嘉庚还组织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会”），并被选为主席；胡愈之、洪丝丝、张楚琨等参加领导工作。该会最有影响的斗争，是声援祖国国统区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运动的一次各界代表大会。全新加坡工农商学及文化界团体 174 个单位代表及知名人士共数百人出席了大会，陈主席号召“政治民主化，全国民众奋志维新，取消蒋介石一切非法条约”，得到全马来亚各地华侨团体的热烈响应。

对于保护华侨正当权利和利益，陈嘉庚做了两件最得人心的大事：第一件，1947 年 5 月 30 日召开全新加坡侨民大会，反对荷兰惨杀华侨、夺船劫货，封锁贸易的暴行，荷兰殖民当局以道歉赔偿了事。第二件，1948 年 3 月 23 日发表《致英国陆军部的备忘录》，痛斥前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报告书中有关华侨的错误和不公平的言论，澄清事实，大快人心。经过多次交锋，对方无词可答。

## （七）

天亮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陈嘉庚回到“梦寐神驰”的解放了的祖国，应毛主席的邀请，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接着在庄明理、王雨亭、张殊明的陪同下，到东北各省进行两个多月的考察。9 月 30 日他被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0 年返新加坡，刊行《新中国观感集》，宣扬新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促进华侨热爱新中国；同时结束未了的合营企业，把款项扫数汇回国，准备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几个月后他回国定居在其心爱的家乡集美，从此投身于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建设事业。

爱国老人在这一生最愉快的时期，怀着新的宏图，开始新的战斗历程，正如董必武集杜甫诗句所赠言：

子负经济才，风雷飒万里。  
树立甚宏达，壮心不肯已！  
时危异人至，六合已一家。  
千秋沧海南，窈窕桃李花。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六合已一家”的胜利，爱国老人为了培植更多“窈窕桃李花”，在沧海南——海防最前线，订出“重建集美学村计划”，立即付诸实施。不怕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轰炸和金门国民党军的炮击，集美学校工地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年近八旬精神焕发的老人，戴着毡帽，拿着手杖，后面跟着建筑工程师、施工负责人、木匠、石匠等，步行数华里巡视、检查、指挥。陈嘉庚就这样为集美学校扩建了建筑面积达 16 万平方米的校舍，等于解放前校舍总面积的三倍多，其中有当时称为厦门市最高建筑物的“南薰楼”，有可容 4000 人集会的福南大会堂和可容 3000 观众的体育馆，从规划、设计、备料到施工都亲自过问，甚至连用什么料，怎样雕刻的技术问题也不放过，精打细算、一丝不苟，群众称他为“超级总工程师”。

陈嘉庚扩建厦门大学校舍的气魄，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从 1951 年到 1954 年，由他筹捐经费、设计、监督施工的建筑面积共 6.26 万平方米，凡 31 幢。以建南大会堂

为中心，东有物理馆、图书馆，西有化学馆、生物馆，五座大楼并列一行，巍峨壮丽，船只从东海进入厦门港，远远就可望见。上弦运动场可容纳观众2万人，游泳池面积6000平方米，都很壮观；建南大会堂的座位近5000个，为全国高等学校规模最大的礼堂。厦门大学位于海防最前线，距离大担、二担只有3000多米；扩建前，有人担心在靠近国民党军前哨阵地修建高楼大厦是否相宜，爱国老人的回答十分干脆：“敌人一边炸，我们一边建，今天被炸了，明天再建造起来！”

“建设集美文化区和风景区”，这是爱国老人的另一夙愿和宏图。为了创造完备的办学条件和美好的学习环境，他发展公用事业，扩充电灯厂和自来水厂，充实科学馆，办好图书馆、扩大医院。他在集美南端筑建海堤，建成内、中、外三个毗连的小池，外池四岸修造七座亭台楼阁，中亭为每年端午节观看龙舟竞赛的场所。集美解放纪念碑建在鳌头小岛上（即“鳌园”内），碑字是毛主席题的，现为游览胜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在爱国老人一生的行动中处处表现出来。他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兴建数十座雄伟的高楼大厦，自己的住宅却是一所简朴的二层楼，抗战期间被炸，战后修复集美校舍时，他指示校方别把那住宅列为修复项目，“第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他定居集美，住在董事会的二楼房间，既小且暗，办事不便，却十分怡然。他打算盖一所“归来堂”为子孙归来之用，直到去世时还未安排，现在的“归来堂”是周总理后来指示兴建的。他的生活艰苦朴素，自奉菲薄。人们参观他的故居，看到那设备的简陋：古老的床、古老的写字台、古老的沙发、古老的蚊帐，都感到惊奇；而衣着的极度俭朴：外衣打补丁，裤子打补丁，鞋子打补丁，袜子也打补丁，更是感叹不已。他晚年为自己规定伙食标准每天五毛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种鱼。招待客人不外家乡风味，陈毅、方方、蔡廷锴等都尝过他特备的蚝煎、炒米粉和猪蹄芋头。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千万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对福建建设十分关心，提了许多建议，都为人民政府所采纳。他认为解放后福建最迫切的要求是修建一条铁路，“全省12万余平方公里，人民1200余万人，竟没有一寸铁路，这种落后状况应该迅速改变。”他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提，写信向毛主席提，给周总理提，当面对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提。他的愿望实现了，鹰厦铁路提前于1956年通车。他倡议移山填海，修建厦门集美海堤和集美杏林海堤，也与鹰厦铁路建成的同时成为现实。他积极推动在厦门建设棉织厂，以谋福建人民纱布自给，取得了成效，杏林纺织厂就这样诞生了。

1955年8月，陈嘉庚开始了祖国万里行，陪行者有庄明理、张楚琨、张其华、叶祖彬。他们访问东北、西北、西南、中南16个省市，看到祖国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迅猛前进，面貌日新月异，兴奋极了。嘉庚先生途中不断给毛主席、周总理和有关领导机关写信，反映情况，提了15项提案建议。1956年元旦发表《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一文，结论说：“我的总观感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做我们前人从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

作为华侨领袖，陈嘉庚对人民政府重视华侨工作，制定正确的侨务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表示热烈拥护。对于他提出的华侨回国投资，设立华侨补校的主张，一一成为事实，他是满意的。1956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陈

嘉庚被选为主席，在开幕词中他号召：“应该广泛地团结和组织归侨、侨眷和华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鼓励并帮助他们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爱国的侨胞对于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应该和祖国人民一道，担负起应负的责任。”

陈嘉庚提倡社会教育，十分重视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1956年在厦门倡办“华侨博物院”，亲自撰写《缘起》，带头认捐10万元，华侨归侨知名人士响应捐资，共得37万多元。大楼建筑面积达4000平方米，于1958年落成。这是全国唯一的华侨博物馆。他在1960年又倡议在北京创办华侨历史博物馆，并首捐50万元。这个遗愿尚待完成。

陈嘉庚热爱党，敬仰毛主席、周总理，说过“知我者党也”的心里话。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和人民生活有什么意见，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对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以及蒙古问题，早就准备公开批评，经周总理说明外交形势和当时各种关系后，就识大体、顾大局，服从党的决定，保留自己意见。谈到“一面倒”，他撰文这样阐明：“平等同行，结为兄弟友邦，以维持世界和平，绝非屈辱依附，自失独立尊严。”他写信给周总理，认为在首都和上海设立“苏联展览馆”有损民族尊严。后来这两个馆改为“北京展览馆”和“上海展览馆”。他到海南岛视察，发现橡胶种植存在许多问题，就给陶铸书记提出整套建议。受到重视和采纳。他要求改善福建卫生状况，1958年1月4日给叶飞省长打了个电报：“闽南最害乡村厕所林立，请严令乡政合作，废私厕，立公厕。”

陈嘉庚著有《住屋与卫生》和《民俗正论集》两本小册子，主张城市住宅建筑要有规划，注意环境卫生，推行健身运动，养成卫生习惯，增强人民体质，做到“人人明白了解”。这些主张，今天看来还是很有见地的。在改革民俗方面：提出嫁娶不宜铺张，迎神应禁止，风水是迷信，减少无谓应酬、酒肉征逐等等，对于今日侨乡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从开国到1958年，陈嘉庚担任过的重要职务，除上述者外，还曾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

陈嘉庚1958年患右眼眉头间上皮癌，同癌症战斗了三年多。1961年8月12日因脑血管病变，全身机能衰竭，逝世于北京，享年88岁。侍奉在侧的有第八子国怀、孙联辉，秘书张其华，生前友好庄明理、张楚琨亦在旁。陈老弥留时刻犹念念不忘台湾回归祖国和“把集美学校办下去”，嘱咐把存款300多万元全部献给国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担任“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丧仪极为隆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在首都各界公祭陈嘉庚先生大会上致悼词说：“陈嘉庚先生生前在拥护国家民族利益，坚决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社会经济面貌，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国外华侨爱国大团结等方面，表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给广大海外华侨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爱国华侨领袖的灵柩盖上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运回集美，举行国葬，永息在鳌园中。

# 我的父亲陈嘉庚

陈国庆\*

先父嘉庚先生有 17 个子女，我是第五子，由于业务关系，我和他比较接近。在父亲数十年的言传身教中，我了解他艰苦创业和爱国兴学的苦心，了解他的生活、为人和个性特征，他的风范永存我心中。

父亲 9 岁入私塾读书，17 岁离开故乡集美，南来新加坡，在祖父杞柏翁的顺安米店学做生意，20 岁返梓完婚，又从塾师读了几个月书。22 岁再度南来，仍旧在祖父的米店做事，一直到 31 岁那年（1904 年），顺安号停业，才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从最初创办的新利川黄梨厂、饼干厂、皮革厂、肥皂厂、砖窑，到后来的树胶熟品制造厂，前后创办的工厂 30 多家，开设的商店百余处，垦植树胶园、黄梨园各万余英亩，雇用的职员工人常达数万人。父亲认为 20 世纪是树胶的时代，因此在许许多多的事业中，他最关注而致力最多的是树胶园的垦殖与树胶熟品制造业。

在事业上略有基础之后，父亲开始关心故乡教育的落后问题，福建光复，民智未开，益使他感觉到普及教育是当务之急。他“思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开始创办了集美小学校，接着创办了集美师范及中学、水产及航海学校、农林学校、商科学校、女子师范及幼稚师范。1921 年又创办了厦门大学。在新加坡，他倡办了道南小学校、南洋华侨中学，又协助闽帮同侨开办爱同学校、崇福学校、南侨女子中学及后来的南侨师范学校，成为华侨爱国兴学的一面旗帜。

父亲在辛亥革命前参加同盟会，以后再没有参加什么党派，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的爱乡、爱国的思想，使他毅然出而领导海外千万华侨捐输支援祖国的重任。早在 1911 年福建省光复时，即于福建会馆召集新加坡闽侨大会，筹款协助福建省维持治安。以后几次闽南大水灾，他都积极地领导筹款救灾的工作。1928 年的山东惨案，1931 年日本侵占东三省，他都是海外华侨捐资救国，抵制日货的先驱和领导者。1937 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他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遂发动组织规模宏大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长期募捐支持祖国抗战，直到最后胜利为止。

父亲的事业到 1925 年进入黄金时代，属下各公司在这年获利 800 万叻币。他显然是南洋一带的富豪之一。可是在生活上自奉甚俭，起居有常。这是他从小养成的良好习惯，而终生不渝。他自己说：“余原抱公忠尽职之心，无论在洋回梓，均不私蓄一文钱，家内亦不许有金饰。”又说：“自南来及返梓三年，未尝妄费一文钱，亦无私带一文回梓。”这是他初到新加坡在祖父米店做事时的情形，以后成了富翁，仍旧保持同样本色。他过着俭朴的生活，也不许家人随意浪费金钱。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早晨 5 点 30 分起身，做甩手运动 15 分钟，6 点

\* 作者为陈嘉庚第五子。

正洗温水澡。在洗澡之前，照例唤我起身，以便一起上班。6点30分吃早餐，一杯牛奶，三个半生熟鸡蛋。他从不喝咖啡，是受了他的挚友林文庆博士的影响，认为咖啡有刺激神经作用。他也劝家人勿喝咖啡。6点45分，父亲和我共坐车离家，7点正抵达设于三吝哇律（即土桥头）的树胶熟品制造厂。进入办事处，他解下外衣及领带，开始巡视工厂的各生产部门。当时全厂男女工有6000多人，产品千余种类。中午12点，召开讨论会，由7位总巡、姐夫温开丰和我，每人报告各自部门的生产情况，并讨论每周的生产计划。每天开会约一小时。下午他便到利答答里律的谦益总行，处理其他业务。总行当时有职工100多人，包括长兄济民、二兄厥祥，以及后来的姐夫李光前。5点下班后，他每周有二三日直接到怡和轩俱乐部吃晚餐，与朋友谈生意，处理学校以及社会事务，夜间12时返家休息。每周有四五天下班后回家吃晚饭，饭后去怡和轩处理社会工作，也是在晚上12时返家。他的晚餐很简单，一碗白饭、一碗番薯粥、一块红豆腐乳而已。饭后无论是在家或在怡和轩，照例散步30分钟，才开始办事。

父亲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事业上和社会公益上，这使他与外界的接触多过与自己家庭的联系。尤其是1923年当上怡和轩主席后，他几乎把怡和轩当成第二个家。到1937年领导南侨总会时期，他甚至长期住在怡和轩，几个月难得回家一次，使他与子女间的隔膜愈来愈甚。在家里，从未看过他的笑容，他只和太太交谈，与其他子女从未讲过话。儿女们对他十分畏惧，觉得他是一位威严很重的父亲。每次他回家，一听到他的汽车声，儿女们一窝蜂地躲入房内，待他晚饭后出门，才敢踏出房门。他每年农历新年总是在怡和轩过，大年初一儿女们到怡和轩列队向他拜年，由于彼此无话可说，前后不过30分钟便离去。

父亲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平日身上的现款不超过五元。他从来不在外头乱花费一分钱，即连怡和轩附近的菜馆、咖啡店，也未光顾过。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有几年他晚饭后不去怡和轩，偶然会带妻儿到勿洛或丹戎巴葛海边游玩，回家的路上顺便吃一杯冰淇淋，这算是在外头最奢侈的花费了。他一生只看过一部电影，是在新加坡首都戏院看的，那是一部为筹赈会义演的片子。他一生只带妻儿到新世界看过一次拳击比赛。他自己的生活简朴，也要求家庭中成员过同样的生活。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母亲买一条领带给我，父亲看见了，斥为浪费，不许我结用，我从此不敢结领带，一直到自己创业时，才结领带。我读英校八、九号班时，向父亲开口讨钱购买一架打字机，被他拒绝了。家中的一套家具，用了10多年已破损不堪，母亲向他要钱换一套新的，结果被责备一顿。又记得当我离开学校到制造厂上班，上班前一晚，父亲对我说，明天自己搭公共汽车去。我要求坐他的汽车去，他不准。6个月后，他才允许我和他同车上班。

在我们兄弟姊妹中，我之所以和父亲比较接近，原因是两人每天早晨一起上制造厂，每个星期天一起到马来亚柔佛州巡视树胶园，后来我参加筹赈会的工作，时常和他联络。父亲也比较关心我：我在道南小学毕业后，原本打算进华侨中学读初中班。这时华侨中学正闹罢课，已两个多月未平息，眼看学潮不易解决，为了不妨碍学业，父亲要我转读英文学校，从五号班读起到九号班毕业。我鼓起勇气向父亲要求到美国读陆军大学。他一口反对。他说我平日出入有车代步，不适宜当陆军，要我以个人的事业为重。他说制造厂正需要人，就到工厂做事吧，不要读什么陆军大学了。我努力争取读大学，还是成泡影。

另一件是关系我的婚姻问题。我离开学校后，一直在制造厂做事，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